

# 深謀遠慮奠磐基

## 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 (一)

● 陶英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暨胡適紀念館主任)

### 代理院長十有八載

#### 出任代理院長經過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五日，蔡元培院長病逝香港。依法要由評議會選舉繼任院長候補人。此為評議會第一次行使推舉院長候補人的職權，不能不格外慎重。由評議會推舉院長候補人，旨在避免政治干預學術，立意雖好，可是實際去做，仍不免有些困擾。

在評議會集會選舉院長候補人之前，各評議員紛紛就可能的人選交換意見。大家所屬意的人有：胡適、翁文灝、朱家驊、王世杰、任鴻雋等。其中爭議最少的是胡適，很多人表示，他是蔡院長最適當的繼承者；但是正在擔任駐美大使，有重責在身，恐不能回國就任。王世杰表示無意

於此，翁文灝、任鴻雋則都有問鼎的意思。此外，尚有一位引起爭議最多的人物，便是顧孟餘。

顧孟餘係汪兆銘（精衛）的智囊之一，自抗戰開始即避居香港，他反對汪於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河內發表通日求和之「艷電」，也未隨汪去南京，成為國民政府所爭取的對象。二十八年十二月八日，顧在蔣中正委員長的安排下自香港到了重慶，顯然欲藉以影響外間對汪的觀感。

及蔡院長病逝，王世杰曾向各方推薦顧孟餘為院長繼任人選。「陶英惠，〈胡適與蔡元培——幾件共同經歷真相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郭廷以先生九秩誕辰紀念論文集》，上冊（民國八十四年二月），頁二十九—三〇。」直到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也就是評

議會開會的前一天，方有「介公下條子」的說法，引起了一些評議員的反彈，王世杰在其日記中記云：

「關於中央研究院院長人選事，陳布雷受蔣先生之託，向翁詠寬等接洽，希望評議會選出顧孟餘。傅孟真大怒，向友人指責，歸過於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民國七十九年三月），第二冊，頁二四四。）

據翁文灝的說法是：「中樞當局曾非正式盼望選舉某君（指顧孟餘）為院長，惟各評議員以此項選舉應以評議員之自身意見為之，不宜有其他意見之影響，當局亦表示可予尊重。」（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翁文灝致胡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中冊，頁四六七。）

陳源聽到的意見則是「一般對於政治沒有興味的科學家卻不願以研究院為酬勳（沒有跟汪去也）的獎品。」（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陳源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頁四六四—四六五。）傅斯年則於八月十四日以長函向胡適談論選舉的過程，茲摘錄數段，以見此事之曲折：

「雪艇（王世杰）以顧孟餘之說提出，約我們去商量。我說，我個人覺得孟餘不錯，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識他，恐怕舉不出來。當時我謂緝齋（汪敬熙）說：『我可以舉他一票，你呢？』他說：『我決不投他票，他只是個 politician（政客）。』……」

忽在開會之前兩天，介公（蔣中正）下條子，舉顧孟餘出來。此一轉自有不良影響。平情而論，孟餘清風亮節，有可佩之處，……然而如何選出來呢？大難題在此。及介公一下條子，明知將其舉出，則三人等於一人，於是我輩友人更不肯，頗為激昂（但仲揆〔李四光〕對此說甚感。

table（贊成），且不下條子為氣，與其平日理想不同。）輾轉傳聞，雪艇疑我是

「說」他鼓動下條子。我當時說，雪艇決不會做此事，可是有些理想，與布雷等談及，無意中出此枝節，容或有之，要之，亦是為研究院。但雪艇總不釋然。次日晚，翁〔文灝〕、任〔鴻雋〕出名請客，談此事，〔陳〕寅恪發言，大發揮其 academic freedom（學術自由）說，及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如學院之外國會員等。其意在公〔胡適〕，至為了然（彼私下並謂，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意指翁〔文灝〕、朱〔家驊〕、王〔世杰〕也。）」（民國廿九年八月十四日〈傅斯年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頁四七四—四七五。）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及二十三日，評議會正式開會，選出三位院長候補人：翁文灝、朱家驊各二十四票，胡適二十票。由於顧孟餘不在候補人名單之內，因而為胡適帶來很大的困擾，並影響到其駐美大使之職位。

評議員們明知胡適不能回國接任院長，也不願意影響到他的駐美大使職務，為什麼還要投他票呢？在傅斯年給胡適的信

中有詳細的描述：

「在昆明時，我曾與枚蓀（周炳琳）談過一下。我說：『你想，把胡適之先生選出一票來，如何？』他說：『適之先生最適宜，但能回來麼？』我說：『他此時決不能回來，此票成廢票。』他說：『這個 demonstration（表演）是不可少的。』我又說：『那麼，選舉出他一個來，有無妨害其在美之事？』他說：『政府決不至此，且有翁、朱、王等在內，自然輪不到他。』……」

舉先生者之心裡，蓋大多數以為只是投一廢票，作一個 demonstration，從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我輩友人，以為蔡先生之繼承者，當然是我公，又以為從學院之身分上說，舉先生最適宜，無非表示學界之正氣、理想、不屈等義，從未想到政府會捨翁、朱而選您。我初到渝時，曾經與雪艇、書詒〔段錫朋〕談過舉你一票事，他們都說：『要把孟餘選出，適之也必須選出，給他們看看。』……然我們如此想者，亦是為國家，在先生則似不應當生到選舉人的氣。其後一想，『學院的自由』、『民主的主義』，在中國只是夢話，但是把先生拉入先生的主義中，卻生如許枝

節，亦是一大 irony [嘲弄]——……

總之，我們願先生留在美任，乃為國家著想，而其選舉乃純是為的『學院主義』、『民主主義』，鬧到此地步，真是哭不得笑不得耳。」（《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頁四七四—四七九。）

這些學者，堅持他們的理想、制度和學院的自由，不惜「忤旨」以拒選顧孟餘為院長候補人之一，看似天真或意氣用事，實則係以非常嚴肅之態度，為使學術不受政治干擾樹立了一個良好的例子，同時也為中研院帶來了很大的困擾；因為由於最高當局對選舉的結果不滿，乃擱置該案遲遲不加圈選。當時的總幹事任鴻雋，實際上並非代理院長，等於無人主持院務，各研究所散處各地，又為躲避戰火在不斷播遷，經費至感困難。又因預算關係，不能長期沒有院長；嗣經熱心院務人士向政府建議，並向國防最高委員會請願，才於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特派朱家驊為代理院長。（孫斌，〈朱家驊先生與中央研究院〉，頁二十六。）虛懸長達半年之久的院長問題，方告塵埃落定。而朱先生自九月二十日就職，至四十六年十月辭職，主持院務達十八年之久，則始終為代理院長

，並未真除。最高當局對此事之耿耿於懷，不難想見；也使得朱先生在代理期間，做得格外辛苦。他曾婉轉的說明出任院長經過云：

「本院評議會選舉繼任院長候補人。

開會前夕，我預感有被選趨勢，曾敦勸大家不要選我，及選舉結果，胡適、翁文灝兩位先生與我三人膺選，當場我宣布不願接受，但不生效，乃請總辦事處將選舉結果，暫緩呈報。延至九月中旬，因預算關係，各所長甚為焦急，催總辦事處即為呈報圈定院長人選，並向國防最高委員會請願。當局考慮結果，因胡先生當時正任駐美大使，使命重大，不能脫身，翁與院中同仁意見不洽，遂發表我為代理院長。我獲知後，即一再懇辭，未蒙允准，遂於九月二十日正式接事。」（《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一〇九—一一〇。）

### 抗戰時的院務發展

朱先生接任代院長後，總幹事任鴻雋辭職，即改聘傅斯年繼任。他於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致傅斯年電云：

「務請吾兄惠允偏勞，勉為其難，否則弟亦只有及早引退，免誤院務；因弟此

次勉允維持，實由兄一再責以大義，今亦欲以大義責兄，風雨同舟，知必有以教我。」（孫斌，〈朱家驊先生與中央研究院〉，頁二十六。）

傅斯年於十月十一日函復：

「必欲勉弟以所難能，此事固難萬分及弟之最不適宜處，本當在吾兄洞察中；然環境如此，兄之固執又如此，只好一時勉從尊命。」（孫斌，〈朱家驊先生與中央研究院〉，頁二十六—二十七。）

人事確定後，即將院中預算算出，並簽請將預算基數破例增加，幸邀特准，院務得以勉強維持。並著手整理法規，先將組織法修正，送請立法院審議。

此外，即增設研究所。三十年三月二十日在重慶舉行第二屆評議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增設數學研究所，先設籌備處於昆明，聘姜立夫為籌備處主任，遲至三十六年七月始在上海正式成所。三十三年三月九日，第二屆評議會第二次會議，又通過增設醫學、植物、體質人類學研究所。關於醫學研究所，朱先生早就有意設置，據二十六年三月七日蔡院長日記云：

「聯先來，詢知本院請增款公文中稱擬增地理及生理兩所。」（高平叔主編，

《蔡元培文集》，卷十四，《日記》（下冊），頁二五一。）因故未能實現。至是重申前議，仍請林可勝籌設生理研究所，而採納林可勝的建議，改稱醫學研究所，聘馮德培為代理籌備處主任，於三十三年十二月在重慶成立。中研院原有動植物研究所，至是分開設立，動物所仍舊存在，另聘羅宗洛於三十三年五月成立植物研究所籌備處。體質人類學原係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四組之部分，至是也另單獨成所，聘吳定良為籌備處主任。抗戰勝利復員後，吳定良赴浙江大學任教，乃告停頓。可見在艱苦的抗戰期間，中研院雖不斷的遷徙流離，仍能有所發展。

### 勝利復員繼續開拓

(1) 各研究所復員京滬：又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時朱院長另擔任教育部長，自九月起，即自教育部撥一筆巨款給中研院，籌備復員工作。（《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一一一。）

因限於交通工具，直至三十五年初，後方各研究所始陸續搬回京滬：天文、氣象、地質、歷史語言、社會科學五所遷回戰前南京原址；體質人類學研究所已停止籌

備；數學、物理、化學、動物、植物、心理、醫學七所遷至日本庚款所辦的前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內，更名為「在君館」，以紀念丁文江總幹事；工程所改名為工學研究所，其鋼鐵部分暫留昆明，餘則遷至戰前中研院原設在上海之理工實驗館內，更名為「杏佛館」，以紀念楊銓總幹事。至於綜理全院性業務單位如評議會秘書處、總辦事處等，均遷回南京舊址，並在上海設駐滬辦事處，以資聯繫。（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編印，《中央研究院史初稿》（民國七十七年六月），頁五十九。）

朱院長於三十五年四月中自重慶回至南京。

(2) 在南京購地建院；勝利復員後，朱院長即積極準備實現戰前各研究所集中南京之計畫。先在南京北極閣後面建造許多宿舍。他於三十五年四月遷都後，覺得北極閣院址太小，不夠將來發展，經在九華山購地兩百四十餘畝，籌建數理化研究中心，擬將在滬之數學、物理、化學三所集中九華山，其餘各所亦移南京，只留工學與醫學兩所仍設上海，前者用杏佛館，後者用在君館。購地手續直到三十六年春天才辦理完成。（《朱家驊先生言論集》，

頁一二。）物理所房舍於三十六年冬首先落成，三十七年春遷入，同時將該所之地磁研究部分移歸氣象所接辦。至於其他各研究所，尚未及遷京而大陸淪陷，集中首都之大計畫遂無由實現。（中央研究院史初稿），頁五十九。）

(3) 增設近代物理研究所：三十四年八月六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舉世為之震驚。中研院受此刺激，數日後，朱院長即邀集翁文灝、吳有訓、吳大猷、俞大維等，商議籌設原子物理研究所，並積極進行。由薩本棟總幹事向美國洽購儀器、物色原子能研究人員，加州大學原子能研究所所長羅倫斯博士也願意協助規劃，並派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趙忠堯赴美參觀在太平洋舉行之原子彈實驗。嗣因軍政部也有意籌設原子能研究所，經薩總幹事建議，將中研院籌備中之原子物理研究所，改稱近代物理研究所，從事理論的研究。惜因大局逆轉，倉促遷台，此項計畫遂致停頓。（《中央研究院史初稿》，頁六十。）

(4) 接辦其他研究單位：日本以退還庚款在華所舉辦之教育文化事業，除上述之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已由教育部撥交中

中研院接收外，另有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以及與該所有關之東方文化事業總會、近代科學圖書館，亦交由歷史語言研究所接收，在北平成立北平圖書史料管理處。旋因華北局勢不穩，選擇其中珍貴之圖書陸續運至南京，三十八年再運來台灣。（《中央研究院史初稿》，頁六十一—六十一。）

(5) 成立院士會議，完成體制：中研院的組織，依照十七年十一月九日國民政府公布之「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於院長之下分行政、研究、評議三大部。行政方面，以總辦事處主持之，設總幹事一人，商承院長執行全院行政事宜。研究部門，以各研究所及博物館、圖書館主持之。又設評議會，為全國最高學術評議機關。此外，第七條則有設「名譽會員」的規定。在歐西各國，學院的構成分子通稱為會員（Member），由學術界負有重望的人士擔任。中研院最初即參照英文之 Member 譯為「會員」，後來僉以為「會員」一詞太通俗，傅斯年所長建議稱「院士」，經評議會通過後確定稱為「院士」（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一九二七—一九四〇〉，頁六一—九。）

中研院自創立後，首先陸續成立了若

干研究所，直到二十四年九月，經多方努力才設立了評議會；由於國內時局擾攘，設備和人力都感不足，學術研究工作基礎薄弱，成熟的學人不多，設置院士，則尚非其時。

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第五次會議中，選出八十一人為第一屆院士，計數理組二十八人，生物組二十五人，人文組二十八人。（《中央研究院史初稿》，頁二一七。）

及勝利復員後，朱院長認為使中研院完成國家學院體制之要求，不容再緩。於三十五年十月八日在重慶舉行之第二屆評議會第三次會議，便開始籌畫選舉院士事宜，嗣經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在南京舉行之第四次會議，由初步審定之四〇二人名單中，再經分組詳細審查，通過一五〇人為院士候選人，於十一月十五日公告四個月，以彙集各方對候選人的意見，再於三

朱院長當選為數理組院士，其合於院士候選人資格之根據為：「研究德國侏羅紀石灰岩。創辦並主持兩廣地質調查所，奠定華南地質研究之始基。」（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國立中央研究院公告」。）同年九月二十三日舉行第一次院士會議。有了院士會議，中研院的體制才算正式完成，全國學術研究踏上了新的階段。（未完待續）

## 三國人物新論

定價二〇〇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彩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歡迎購閱，定價台幣二〇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